

“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黄小用, 楚翔宇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 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 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安全困境; 东亚安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2-0189-08

2005年以来, 由于历史问题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 特别是2006年8月15日, 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不顾各方反对, 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使得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最艰难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一直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众多关心和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无不在如何走出中日历史困境问题上煞费苦心^[1-5]。在笔者看来, 历史问题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 潜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中日之间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 对当前从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出现的问题, 促进中国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两国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盛唐时期, 两国文化交流达到高潮。而在16世纪中期的明朝时期, 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 中国奋起抗击。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朝鲜向中国乞援, 中日交恶。在清朝后期,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如果从1871年算起, 近代以来中日发生直接交涉关系迄今超过130年。其间, 中日两国经常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从1894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 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 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由此不难看出, 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 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从战后到1972年中日正式

建交前这一段时间内, 日本政府奉行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 虽然高层往来稀少, 但民间往来却不断增多。从1972年正式建交到1989年这十几年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 高层互访增多, 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日本逐渐成为对华最大的援助国。整个90年代是既有波折又有发展的十年, 经贸往来日趋紧密, 但在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也不断出现,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军国主义也逐渐抬头。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呈现“民间热官方冷”、“经济热政治冷”的局面。尽管日本失去了当年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日经济的相互拉动作用日益突出。与此同时, 两国持续冷淡的政治关系与发展势头迅猛的经济关系却形成了鲜明对照。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长期中断, 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 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像这样前热后冷的发展悖论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历史问题是导致中日关系变冷的根本原因, 那么, 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没有成为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而在这之后却日益突显, 成为两国交恶的焦点呢?为什么在中日经济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今天, 两国关系反而倒退呢?实际上, 历史问题早在中日两国建交时就业已存在并已得到处理。在当时建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 日本明确表示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 中方则表示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这说明中日关系发展中出

现的变化一定有着比历史问题更为深刻的根源,双方一定有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战略利益考虑。基于上述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两大悖论分析,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历史、经济等因素只是中日关系变化中的干预变量,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两国的战略利益冲突,而安全利益是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性质的首要因素,鉴于此,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出现摩擦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陷入了短期难以逆转的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是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被看作是国家间关系中最重大和广泛的特征,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6](29)}

“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在1950年《世界政治》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中,权力单元发现它们无论何时都彼此共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对其施加行为准则,从而保护它们免于相互攻击。在这种条件下,来自于相互猜疑和恐惧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而争夺更多的权力。而这种努力证明是自我挫败的。”^{[7](157-158)}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他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有一段经典描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着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的了解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做出可以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8](21)}

因此,基于对方意图的难以决断的不确定性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一个核心特征。正是对别国意图的不确定性,才产生了疑惧和不安全感,而相互疑惧所致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自我挫败,进入了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不断上升敌意的“螺旋模式”中。约翰·赫兹为此感叹道,“正是由于对自己邻居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才使人类处于困境之中”^{[9](3)}。

观察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所处的情势完全符合安全困境的构成要件。双方互不信任,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明显抱有难以决断的巨大不确

定性。因而今天中日两国相互疑惧的气氛甚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影响广泛,不少中国人亦心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之疑虑,目前中国与日本深陷安全困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可谓大行其道,主要集中在“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上。所谓“政治威胁论”,日本各派战略家都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和令他们感到担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正是来自所谓“中国的威胁”。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但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也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10]关于“经济威胁论”,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日本有些人对此心里非常不平衡,大肆散布“中国经济挑战论”,其中又包括“第三世界强国论”和“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所谓“第三世界强国论”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底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一书,该书称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达1.66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上升到6%。日本媒体引用这一说法,称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超级经济大国。所谓“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指西方媒体不断渲染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之和已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还宣扬海外华人资金如何雄厚,说“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华人已掌握东南亚经济命脉”。1993年11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曾发表一篇题为《正在抬头的华人经济圈》的文章,指出以香港和台湾为中心居住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大约有5500万,拥有流动资产20000亿美元,是日本的三分之二,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5000亿美元。文章据此指出,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的华人经济圈必将对亚太特别是日美经济造成巨大冲击^[11]。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观点是对中国的正常军费增长大肆渲染,称中国军费连续几年以两位数增长,在亚太地区“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诬蔑中国向一些国家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转让核技术给“不负责任的国家”,从而造成了地区局势紧张和冲突升级;宣扬中国借实现军队现代化之机,大肆扩充军力,试图填补因美苏冷战结束而造成的地区真空;散布中国准备利用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控制南沙群岛等有争议的岛屿。有人甚至把中国打击“台独”势力也说成是对日本及地区安全的威胁。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演

习, 日本有些人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 散布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 演习是“强者欺负弱者”(甚至将其说成“大国欺负小国”), “现在对台湾这样做, 将来对日本也可能这样做”^{[12](333)}。日本学者中西辉正断言, 在2010年前后形成亚洲新格局的时候, 中国将超级大国化, 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同过去的超级大国一样的态度, 从而成为亚洲的“威胁”^{[13](183)}。因此, 日本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力量现代化和每年正常军费增长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

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在中国也备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 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出于争当世界霸主的战略需要, 对日本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庇护的政策, 致使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漏网, 其中不少人甚至重新进入日本政治中枢, 身居要职。由于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 军国主义思潮没有彻底肃清, 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直到今天右翼分子尚能在日本兴风作浪, 翻历史旧案, 美化昔日侵略战争的事情时有发生, 尤其是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执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对与深思。近年来, 战后一直规范日本发展方向的和平宪法逐渐被架空, 日本加快走向“普通国家”步伐, 谋求在军事上发挥更多作用。所有这一切, 在日本当局加速军事大国化的背景下, 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与不安, 中国十分担心日本通过否定侵略战争, 最终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中日安全困境不仅仅表现在两国的相互不信任上, 对于一些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事情上, 双方也存在着许多的竞争与矛盾, 从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中日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石油进口则次于美国和日本居第三位。理论上讲, 两国在建立亚洲石油供应体系、维护石油供应安全上还是存在不少共同利益的。但由于两国在进口来源上还有不少是重叠的, 而且石油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 使两国在争夺油源陷入困境的可能性比单纯经济博弈更高。两国之间从来就没有能源沟通协调机制, 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区域层面上, 使能源竞争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状态,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争夺战^①。在这场石油博弈中, 俄罗斯出色地

扮演了“警察”角色, 分别从中国和日本获取不少战略利益。这种战略利益表现在, 俄罗斯不仅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中日两国的“消费者剩余”, 而且还在两国之间打进了“楔子”, 降低了两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所谓的“战略威胁”。以后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 其付出的成本都将是沉重的。鉴于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战略性, 两国在此博弈中实现合作的可能要远小于经济合作的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区域一体化是东亚区域事务的重要内容, 谁掌握了东亚区域合作事务的主导权, 谁就掌握了区域战略的制高点, 因此积极推动区域内双边合作就成了中日两国维护自己区域战略利益的基本手段。毋庸置疑, 中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既存在竞争性, 又存在着“共生”的利益。中国是区域政治大国, 日本是区域经济大国, 两国都没有单独主导区域合作的能力, 因此东亚区域合作需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如果中日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提高国际地位, 同时也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和平发展。但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日本选择了一条同中国竞争而不是合作开发的道路, 以至于日本几乎所有的区域合作倡议都要尽力绕开中国。其原因一是日本农产品市场不开放, 而中国是农业大国; 二是日本更加看重合作中的相对收益; 三是美国不希望出现团结的亚洲, 日本的区域合作设想常受制于美日联盟的刚性约束。笔者认为, 同石油领域类似, 中日两国亦在这场区域战略博弈中陷入困境状态, 而且责任主要在日方。这可以从日本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区域战略中找到答案。

东南亚是日本长期重点经营的地区, 日本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 东盟则是日本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日本战略图谋是, 一方面试图维持该地区旧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 努力把“雁行模式”固定下来,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合作, 以此牵制和平衡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 2003年12月, 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粉墨登台了。在东北亚, 日本战略可归结为: 阻止该地区出现“中日双强”或多强并立的局面, 以维持日本战略优势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 东北亚在功能一体化上已经取得进展, 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合作迅速升温, 客观上需要有制度一体化提供保证。但出于战略考虑, 日本对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并不热心, 而是推崇先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以试图绕开中国^②。日本方面对此的解释

是,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影响难以预测,日本可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但其真正的考虑是,在同东盟合作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若再按照中国的建议搞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亚洲的通商框架结构很可能会按中国的步调前进,这是一种让日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前景。

因此,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关系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程度,但仍然在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彼此疑惧,在战略利益的竞争上互为对手,结果使得双方的不安全感更为突出,随着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日趋对立,中日两国进入了不断上升的安全困境的敌意螺旋模式中。那么导致这种安全困境发生的原因到底来自何方呢?

二、中日关系中安全困境的根源

对于安全困境的成因,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认为人性恶是导致安全困境的原因,这种看法与经典现实主义相一致。经典现实主义鼻祖汉斯·摩根索认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存在于人性之中”^{[14](3)},而人性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也存在于国与国之间,每个国家都尽力为自己攫取最大的权力与利益,国与国之间没有道德的约束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而约翰·赫兹认为安全困境是由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这种看法与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而在自助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疑惧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肯尼斯·华尔兹所指出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它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15](5)}。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国家间关系不确定性及其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6](36-38)}。罗伯特·杰维斯也认为,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所致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16](60-89)}。

客观地说,以上三种不同路径的原因分析各有千秋。笔者认为从国际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似乎更具说服力。因为引起安全困境的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似乎并不在于人性的“恶”,如果行为体所处的体系是

一个有序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本身就可以对行为体的“恶”实行有效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不是邪恶用心,而是无奈境地^{[16](59)}。导致困境出现的心理恐惧因素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出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寻求安全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如果将这种安全困境模式称为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话,那么,这种安全困境模式诞生于特定的国际结构,常常存在于霸权国与崛起国或新崛起的几个大国之间。大国崛起是这种结构性安全困境生成的直接动因。因为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往往会加深国际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必然引发霸权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和强力反弹,导致常态下的国家关系骤然陷入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之中。2500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就处于这样的困境中: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才使得战争不可避免^{[17](22)}。从程度上而言,这种模式大体上属于赫兹所说的某种“激烈的安全困境”,处于这种结构性安全困境模式中的国家间战略利益难以调和,除非一方主动放弃其战略目标,否则,国家间的激烈对抗不可避免,这可谓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

从历史上看,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不仅会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造成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且极易成为战争导火索。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通过发展工商业和海外扩张开始崛起后,面临着同早已建立起强大殖民帝国的西班牙对抗的安全困境。英西针锋相对地扩充海军军备的行为导致双方1588年在英吉利海峡展开决战,最终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英国从此开始确立海上霸权。但是,随着其后荷兰、法国等国的相继崛起,欧洲地区的国际结构始终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军备竞赛、安全竞争、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英国通过三次英荷战争和七次英法战争解决了它们之间面临的安全困境。然而,19世纪末德国的骤然崛起,又使英德之间陷入了深刻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致引发两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的霸权优势从此不复存在^[18]。二战后崛起的美国 and 苏联同样深陷安全困境之中,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军备竞赛和冷战,更是史无前例地主导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的走向。

综上所述,国际结构是国家之间安全困境发生的最深厚的基础。将中日两国的问题放大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结构中进行审视,就不难发现,东亚地区的力量结构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新

兴大国正在迅猛崛起, 综合国力日益提高, 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①[19](68)}; 而日本不仅在经济长期萧条后继续维持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 还出现了谋求所谓“普通国家”地位的大国化战略取向, 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这样, 中日两国正在同时崛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东亚地区将首次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格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某种零和效应, 两国同时崛起更是将这种效应充分放大, 加速了安全困境的形成, 这也正是目前两国关系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一针见血所指出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 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20](235)}中日两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今天双方必须认真对付的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日本现在对这种“两强制”局面的不适感明显超过中国。因此, 来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动作也明显多于中国。

日本面对作为近邻的中国的崛起, 最深刻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正是基于这种认知, 日本完成了对华战略的重新定位。2002年由小泉外交智库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通篇围绕着一个隐含的战略主题, 即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并认为日本遇到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 在安全方面,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 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21]。2004年12月, 日本新的防卫大纲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发展在加强, 特别是要扩大海洋活动的范围”。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海上权益工作组”组长五建进三更进一步强调, 中国要把太平洋两侧海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把台湾并入国土, 并同时影响从东北亚到波斯湾的海上通道。这种严重偏颇的战略判断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出现, 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强烈不安, 在这种心理因素刺激下, 日本一改以往消极的安全战略, 正在越来越明显地采取积极大胆, 甚至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策略, 对中国崛起做出防范之势。

对中日安全困境形成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是理解中日矛盾的基础, 同时, 还需要注意: 一个结果往往不只是一种原因所引起的, 而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 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 而且还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其霸权战略, 力图主导东北亚安全事务构成了影响中日安全困境的强大外部力量。

从本质上说, 美国政府既担心中国的崛起, 也担心一个将要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已经在经济上崛起的日本接近, 因为中日两个大国相互走近并加强合作, 难免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让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互相“掐架”是维持自己领导地位的最有效办法。美国深知日本国内存在一种强烈的“厌美”、“反美”情绪, 中日摩擦引起的日本国内“厌中”情绪上升, 正有利于转移日本国民在很多问题上对美国的不满和反感。因此, 布什政权不会坐视和容忍中日之间出现所谓“政热经热”, 不会容忍中日携手推进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地区合作, 布什政府希望看到的中日关系是一种不即不离、不断摩擦的关系, 但未必希望看到中日发生冲突。在美国政府看来, 中日关系交恶有一条底线, 即中日关系恶化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一方面要确保美日、美中关系好于中日关系, 从而使美国在战略上处于最佳位置;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中日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样既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 损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 又将削弱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归根结底, 维持中日“斗而不破”的局面最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总之, 中日安全困境与两国各自的国内因素、甚至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构成了内外交错的复杂局面。因此, 在处理中日安全困境时, 不应把视野仅限于中日两国, 而需要从地区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 将中日关系放在国家发展和国际战略的全局来考虑和衡量, 把有利于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和有利于维护国内稳定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

三、中日关系中安全困境的缓解对策

“安全困境”, 概念源自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其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 国际关系理论各主流学派都承认它的真实性。但是对安全困境是否能够解决和怎样解决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新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并不仅仅是取决于国家特性, 更主要的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决定的, 是国际政治的正常现象。“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安全, 而面对自己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 集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 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 并且彼此敌视, 尽管就其本性而

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就个别而言,国家可能只是以此来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22](3)}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因此,国家始终生活在自助的逻辑和处在不安全的处境中,而不论单元(国家)是什么性质。“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22](4)}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无法摆脱安全困境,正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是否像新现实主义理解的那样,是国际政治固有的特征和国家所必须面对的一种状态呢?建构主义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认为安全困境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行动者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行动者的主体间性,从而可以改变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使行为体的行为从安全困境中摆脱出来,建立起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国家互动的行为造成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只要国家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互不信任的主体间认识,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23]。阿德勒和巴纳特通过对地区安全共同体的考察验证了国家之间可以避免安全困境,他们把安全共同体定义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国家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24](30)}。阿德勒和巴纳特还勾勒了可资借鉴的安全共同体初始、上升和成熟发展阶段的三层级图式模型^{[24](Chapter 1)}。

笔者认为,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权威的世界政府存在,也不存在一个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因此国家之间的疑忌是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也是不可能完全释解的。但是,并不是说人们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就无能为力,因为共同利益是国家之间沟通与合作的纽带,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合作空间。这里的利益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安全的保障,也包含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安全困境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但通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与沟通,缓解安全困境是可能的。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释解的安

全困境,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能真正沟通,努力寻找双方的战略利益交汇点,并切实加强沟通与合作,是可以把安全困境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的,这也是两国人民的福祉所在。

中日两国如果想避免大国崛起的血腥历史剧再次上演,只有一种选择,即努力缓解乃至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友好共处。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中日两国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建立东亚合作安全机制应该可以作为缓解中日安全困境的起步。

对中日两国来说,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应从地区视角出发、以东亚为载体来培育双方的信赖感。然而,从东亚的整体安全现状看,东亚地区仍处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传统均势安全模式之中,停留在大国制衡的层面,它不能真正解决新形势下东亚国家的安全问题。随着安全相互依存和区域内互动的加强,东亚走向安全共同体是必然的选择。目前,东盟国家的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已经起步。2003年10月7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首次正式将2020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作为东盟区域安全合作的最重要目标。考虑到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关系现状,建设中的安全共同体第一层级的安全模式应着眼于“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合作安全”。“大国协调”是指区域安全由该共同体内两个或更多的大国集体负责。而“合作安全”旨在加深安全的相互理解并拓宽安全的定义,这种安全机制倾向于协商而不是对抗,是冷战后出现的“最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25](140-146)}。那么东亚如何从原来传统的均势安全模式走向大国协调下的合作安全呢?事实上,东亚已经出现次区域的“大国协调”,那就是2003年启动的由美、中、朝、韩、俄、日参加的关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六方会谈”。这等于承认相关大国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有“特殊的责任”,而这正是“大国协调”的一个“核心原则”^[26]。六方会议,虽然最后的结果尚难以预料,但“六方会谈”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解决朝核问题本身,它启动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对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它不仅“有助于削减东北亚次区域的冲突和其他严重的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为整个亚洲创造积极的安全与稳定的环境”^{[27](63-69)}。需要指出的是,以“六方会谈”为标志的“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合作安全”,还只是共同体初始阶段的安全模式,它是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合作,还不能进行完全有效的危机管理。因此,这就需要大力推动第一层级的安全合作走向第二层级。具体而言,就是提升六方

会谈的作用,使其升格为与东盟地区论坛并存的正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实现六方会谈的长期化和制度化,然后以此为基础整合和构筑整个东亚区域的安全机制。按照阿德勒和巴纳特关于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层级理论,第一层级上升为第二层级的关键取决于结构和过程两类要素。在结构要素中,大国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东亚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交汇集中之地,就目前形势看,在东亚,不管是建立何种安全模式都难以摆脱美国的参与,这是美国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应该承认,美国在稳定东亚地区现存秩序方面有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美国由于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维系全球霸权的意图,也有消除挑战国野心的意图;既有建立地区安全框架,主导地区安全、威胁认识的意图,也有维持、发展、变革传统同盟关系,使同盟更具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的意图;既有政治的意图,也有经济与安全的意图,还有某种文化、文明方面的意图;既可能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安排,也包含某种以能力为基础的灵活性的策略选择。对于中日关系来说,美国的影响既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在目前时代看,更多的是相互的,这使得中、美、日关系的构筑和互动在冷战后的份量大大加重,从而直接左右着地区形势发展的方向。中日两国应积极利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有利因素,寻求中、美、日三国的良性互动,促进东亚地区合作。

东亚地区合作将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不采取“东亚至上”的内向方略,这也是在目前全球和东亚地缘格局中,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功的一个现实选择和结构需要。在过程要素中,国际制度和组织作为过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家间的信任和认同。经过各方的努力,“六方会谈”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性机构。这个多边安全组织框架,应该成为中日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增信释疑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平台。

然而,要消除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还有赖于两国认知的完全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培育双方的集体认同。因为只有实现了集体认同,双方才能形成对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集体认同首先是经济利益上的认同,在国际关系当中,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写道:“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

一方面,力图在经济上得益的愿望是寻求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因而群体间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经济活动类型尤其是行为者能从国内或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种经济活动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趋势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与力图在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最终会纠缠在一起。”^[28]

为此,当前紧要的工作是中日两国积极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培育认同与信念。到目前为止,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基本上是在“10+3”的框架下进行的。《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也是在这一框架体系内出台的。不过,这一宣言的出台很显然说明了两点:一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加强三边合作对于三国未来乃至对于整个东亚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奥田硕所言:“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了谁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日本和中国,抛开中日两国谈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29]二是在目前制度基础缺失的情况下,三国之间的区域合作需要依靠“10+3”机制这一平台。《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就明确指出,要推动“10+3”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要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3”这一构架的最大好处是从更为开放的角度为中日韩合作搭建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都具权威和高效的平台。三国之间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开展合作,都可以包容在这一框架之内,具有很大的弹性。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10+1”和“10+3”将并行发展,最终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条件下,将会过渡到由中日韩三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从而实现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愿望。充分利用现有的“10+3”合作机制,将两国在东亚合作中开展的双轨区域合作道路并轨,把两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整合拓展为范围更为广泛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积极谋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化的“东亚共同体”。这样的组织不但可以在价值观、规范和文化的扩散和制度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而且可以鼓励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各国和社会将它们想象为某一地区的一部分,并通过灌输诸如共同货币、自主的规范和实践等共同命运意识来培育和强化地区认同感。

总之,“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两国在安全困境驱动下单方面“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彼此

真正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地区视野内建构起安全共同体,才能突破历史上大国崛起所致安全困境的冲突定式,实现双方共赢的安全利益。安全互信与认同建构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更决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地区安全共同体真正建立之前,同时处于崛起背景下的中日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避免。但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实现战略和解,走向安全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注释:

- ① 1996 年 4 月中俄两国政府确定铺设一条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线,2001 年 9 月两国政府就该项目签署正式协议。但从 2002 年底开始,日本动用其外交资源劝说俄罗斯放弃安大线,把石油管线的终点改为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港,从而让更多石油输给日本。后来,在中日双方的左右游说下,俄罗斯立场摇摆不定,给中国和日本均带来巨大战略利益损失。
- ② 2003 年 12 月 22 日,韩国和日本代表在汉城就两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进行首轮政府间谈判,确认将在 2005 年以前结束全部谈判。
- ③ 关于中日综合国力的比较,笔者认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论据充分、结论可信。该报告所估算的美、中、日、印度、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22.785%、7.782%、7.749%、4.365%、2.808%;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已经非常接近(为 1 比 0.996);从 1980 年至 1998 年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幅度(3.046)为同期日本综合国力提高幅度(1.712)的 1.779 倍。可以说目前正是上升中的中国与相对停滞的日本在国力对比变化过程中“擦肩而过”的时期。详情参见参考文献[21]。

参考文献:

- [1] 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J]. 战略与管理, 2003(2): 71-75.
- [2] 于铁军. 国际政治理论与中日历史问题[J]. 太平洋学报, 2003(3): 45-53.
- [3] 刘江永.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J]. 外交评论, 2005(3): 84-92.
- [4] 冯昭奎. 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与中日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6): 24-30.
- [5] 汤重南. 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J]. 日本研究, 2006(3): 1-7.
- [6] Wheeler N, Booth K. The security dilemma [C]// Baylis J, Rengger N 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 [7] Herz J H.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J]. World Politics, 1950, 2: 157-158.
- [8] Butterfield H.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M]. London: Collins, 1951.
- [9] Herz J.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 [10] 佐伯喜一. 冷战以后亚洲的安全保障 [J]. 日本问题资料, 1993(8): 1-5.
- [11] 何礼, 丁亚华. 别有用心的世纪谎言“中国威胁论”[J]. 中国国情国力, 2000(2): 16-20.
- [12] 冯昭奎. 21 世纪的日本: 战略的贫困[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13] 李建民. 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4]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15] 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16]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17] 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8] 叶江.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2): 39-40.
- [19] 胡鞍钢. 中国大战略[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0] 金熙德.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新动向[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 [21] 金熙德. 面对崛起的中国——解读“21 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DB/OL].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ch-yuwai/264390.htm>, 2005-12-07.
- [22] 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23]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5, 20, (1): 71-81.
- [24] Emanuel Adler,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5] 克雷格·A·斯奈德. 当代安全与战略[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26] Amitav Acharya. A concert of asia? [J]. Survival, 1996, 41(3): 95-98.
- [27] Amitav Acharya. Concert of powers in the asian pacific [C]// Derek Dacanna. The Evolving Pacific Powers Balanc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6.
- [28] 李海海.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B/OL]. 联合早报网论坛,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sino_jp_forum020304.html. 2004, 2004-09-15.
- [29] 纪荣. 东亚共同体: 中日韩制造新“欧盟” [DB/OL]. http://www.bh.gov.cn/news/2004-10/19/content_3058349.htm. 2004, 2004-10-19.

(下转 229 页)